

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的兴起与运作逻辑

——基于豫东Y村的田野调查

李爱爽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武汉 430073)

摘要: 农机跨区服务是小农户实现机械化生产,从而融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的重要途径。但近年来,跨区服务面积大幅减少,以本地农机手为服务供给者的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逐渐兴起,且社会因素在其兴起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随着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快速发展,大型农机拥有量不断增长,农机服务市场呈现出外来农机和本地农机并存的局面。在农机服务市场竞争中,本地农机手借助乡土熟人社会的运作规则打败了外来农机手,从而推动了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的兴起。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的运作高度嵌入乡土社会。在农机服务市场的高度竞争下,农机手以自然村为单位开展农机服务。农机手置身于乡土熟人关系之中,熟人关系可以降低其经营成本。而较低的服务经营成本能够提升农机手的经营积极性,从而确保农机服务供给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村庄社会中的声誉机制能够有效抑制农机手的机会主义行为,并能够激励其不断提高农机服务质量。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的出现,体现了乡村社会助推现代农业发展的内在潜力,对探索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 农业机械化;农机服务市场;乡土社会;熟人关系;农业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7465(2023)02-0072-11

一、问题的提出

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标志,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近20年来,我国农业机械化实现了飞跃式发展。2021年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已经达到72%,比2000年提高了近40个百分点。其中,三大粮食作物即小麦、水稻和玉米的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已分别超过97%、85%和90%^[1]。我国农业机械化的迅速发展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独特的实现路径。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进城务工,家庭农业劳动力出现了结构性短缺^[2],农村社会对农业机械化有着强烈的内在需求。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的颁布,以及中央财政对农业机械化的大规模投入,推动农业机械化进入高速发展时期^[3]。但与此同时,在现阶段乃至未来较长时期,小农户仍是我国农业经营的主体^[4]。受限于小规模经营的资源条件和农业收入水平较低的经济状况,绝大多数小农户并非直接购置大中型农业机械,而是选择购买农机作业服务^[5]。农机服务市场作为小农户获取专业化农机服务,从而与现代农业发展方式有效对接的重要途径,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以往关于农机服务市场的研究,主要有三种理论视角。一是国家视角。相关研究指出,国家对农机购置补贴力度的加大^[6]、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7]、对农机服务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国家视角的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探讨国家农业政策对农机服务市场的影响,但缺乏对农机服务市场具体运作过程的微观考察,忽视了农机服务市场运作的社会情境以及市

收稿日期:2022-05-12

作者简介:李爱爽,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场中各行动主体的行为逻辑。二是资本视角。有学者借鉴“占取主义”的分析框架,认为农机服务市场有其内在的运作机制,其实质是资本对农业生产环节的重塑和对农业剩余的占取^[8]。资本视角的研究侧重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考察农机服务市场的兴起和运作机制,但忽视了农机服务市场的兴起和运作过程还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意涵。三是土地视角。有学者以华北平原地区为例,认为农机服务市场的形成是社会分工的结果,而社会分工的产生是由于该地区的地貌类型与农地经营规模不相匹配^[9]。土地视角的研究着重从土地资源条件等角度分析农机服务市场出现的经济原因,但忽视了农村社会关系、社会规范、社会机制等社会性因素对农机服务市场的影响和塑造。

近年来,一些学者敏锐地注意到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的兴起,并捕捉到农机服务市场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密切关联。有学者在实地调研中发现,农村内部的农机服务市场已经存在,且以村庄为基本单位、由本村村民提供农机服务的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熟人社会构成了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重要的组织资源,是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使农机服务达到低价均衡的有利条件^[10]。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的形成,其本质是村域内农业生产活动的社会化分工和农户农机服务需求的内部满足,农机手与农户凭借乡村社会的内生优势,实现供需的有效对接,并通过需求整合、利益优化和舆论约束机制,降低双方的交易成本,保障农机服务的稳定性与持续性^[11]。这些研究对理解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的形成和运作机制,以及农机服务市场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内在关联具有重要启示,但仍有进一步推进的空间。这些研究主要从供需角度探究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的形成机理,但忽视了乡村社会交往规则在其形成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主要关注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中农机服务的交易成本、价格水平等问题,但对农机服务的供给范围、经营成本、供给质量等问题缺乏足够重视。

事实上,乡村社会作为农机服务经营和交易活动发生的社会场域,其对农机服务市场的影响和渗透是全方位的。乡村社会内部有着交织密切的关系网络和丰富复杂的人际交往规则,其深刻影响着小农户、农机服务供给者、农机服务中介、农机维修工等市场行动者的行为选择,进而塑造着农机服务市场的实践样态。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高度嵌入乡村社会,其兴起和运作过程均具有浓厚的社会学意蕴。正如波兰尼所指出的,人类的经济活动嵌入其社会关系,经济体系依靠非经济动机得以运转^[12]。鉴于此,本文尝试在已有研究和调研经验的基础上,将农机服务市场置于乡村社会场域中进行考察,从社会学角度探讨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的兴起和运作逻辑,以期深化对农机服务市场与乡村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进而为探索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提供有益参考。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源于笔者及所在研究团队于 2021 年 7—8 月在河南省东部 W 镇 Y 村开展的田野调查^①。W 镇位于华北平原南部,是一个以种植小麦、玉米为主的农业大镇。全镇耕地面积为 6.9 万亩,地势平坦,土地连片,适合机械化作业。Y 村是隶属于 W 镇的一个行政村,下辖 6 个自然村 8 个村民小组,现有人口 300 余户 2170 人,共有耕地 3429 亩。当地主要粮食作物的耕、种、收等关键生产环节均已经实现机械化。在播种环节,农户主要使用自家购置的小型播种机;在耕地、收割等环节,农户直接从市场上购买农机服务,农机服务供给者以个体农机手为主。调研期间,我们通过对普通农户、农机手、农机服务中介、农机维修工、村干部等人员的深度访谈,获取了关于农业生产、农业机械化和农机服务市场的丰富素材。

二、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的兴起

农机服务供给模式主要分为跨区服务模式和本地服务模式两种类型^[13]。从农机服务需求

① 按照学术规范,本文涉及的人名和地名均为化名。

者(即农户)的视角来看,前者以外来农机手为服务供给者,而后者以本地农机手为服务供给者。农业经济学者对农机跨区服务已有深入研究,并主要关注跨区服务模式的形成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简要来说,我国地域辽阔、南北气候条件差异明显、地区间农作物生长期具有时间差以及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存在区域差异,为跨区服务模式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14]。大范围的农机跨区服务不仅使农业生产实现了专业化分工,产生了规模效应,而且使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对粮食产量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即其他区域的农业机械化发展可以通过跨区服务对本区域的粮食产量产生积极影响^[15]。而从调研来看,虽然农机跨区服务过去的确是当地农户实现机械化生产的重要途径,但近年来,跨区服务面积大幅减少,而由本地农机手提供农机服务的内生型服务市场逐渐兴起。

(一) 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兴起的宏观背景

从宏观层面来看,跨区服务面积的大幅减少与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的兴起,与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快速发展紧密关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业机械化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79年到2003年。这一时期,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速度缓慢,农户自用的小型农机具的拥有量逐步增长。第二个阶段是从2004年至今。这一阶段,大中型农机拥有量大幅增长,农业机械化水平快速提升,大中型农机购置者成为农机服务从业者的主力^[8]。2004年之所以成为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主要是因为我国自2004年起开始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而且之后农机购置补贴力度不断加大,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向大中型农机和农机社会化服务倾斜^[16]。截至2021年底,中央财政已累计安排农机购置补贴资金2582亿元^[17]。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实施降低了大中型农机的购置成本^[18],增强了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机作业服务主体的购机能力,有效激发了农户的购机热情,推动了大中型农机购买量的大幅增长^[6],促进了我国农机行业的蓬勃发展^[19]。2005年到2015年是我国农机行业的“黄金十年”。

在农机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农机服务市场发生了重要变化。2004年至2013年,我国农机跨区服务面积持续增加,但在2014年我国农机跨区服务面积出现了骤减,与2013年相比,下降幅度达到19%,其中,跨区机收面积的同比下降幅度达到32%^[20]。此后,我国农机跨区服务面积呈现持续大幅下降的趋势^[11]。这一现象可以从农机作业服务供给的角度来理解。过去,在我国很多地区,由于本地缺乏农机手,农户不得不通过购买外来农机手提供的农机作业服务来满足机械化生产需求,而随着国家对农机购置补贴力度的不断加大,在诸多农村地区本地大型农机数量快速增长,本地农机服务主体不断发展壮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机跨区服务市场开始萎缩,本地农机服务迅速崛起^[21]。即跨区服务面积的大幅减少与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的兴起,是在我国农业机械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发生的。因此,接下来的讨论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不过主要聚焦于跨区服务面积减少与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兴起的社会原因。

(二) 外来农机手的经营模式及其局限性

随着打工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和妇女化特征日益明显,当地原有的小型农机作业服务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农户当前的农机使用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跨区流动作业的外地大型农机逐渐成为本地农户最主要的农机服务来源^①。例如,在小麦收割环节,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的农机手利用地区间小麦成熟期的时间差,驾驶自己的联合收割机,从皖北出发,由南向北跨越数百公里,为沿途村庄的农户提供专业化的小麦机收服务。农机跨区服务的开展既提高了农机的利用率,又使跨区农机手获得了较为可观的经济收益,还大大降低了农业耕作

① 2000年前后,当地一些农户购置了小型的小麦收割机,除了自用以外,也为本村其他农户提供有偿的小麦机收服务。小型收割机的服务费较为低廉,为5~10元/亩。随着打工经济的发展,小型收割机的局限性也愈发凸显:一是用时较长,需要半个多月才能完成小麦收割;二是收割完小麦后,农户还要完成小麦的装运、晾晒、脱粒等多道工序。由于小型收割机的使用需要农户投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当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进入本地以后,本地原有的小型收割机便很快被农户所淘汰。

的劳动强度,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回应了本地农户对大型农业机械的迫切需求。在农忙季节,外出务工的青壮年男性劳动力不用返乡,仅依靠留守村庄的、具备一定务农经验和能力的老人和妇女就能顺利完成农业生产。

外来农机手到本地村庄开展农机作业服务,主要采取“农机+中介”的经营模式。一方面,大型农业机械是进行跨区作业的主力。另一方面,不可忽视的是,农机跨区服务的开展意味着驾驶和操作农机的劳动力——农机手要进行空间上的流动和转移,要离开原有的熟人社会到异地他乡进行农机作业^[22]。而外来农机手想要顺利进入村庄为本地农户提供农机服务,需要通过农机服务中介的带领。农机服务中介一般是在本地有着广泛社会关系和较高社会威望的人,如村组干部。农机服务中介会向外来农机手收取一定的佣金。除了负责为外来农机手安排食宿、联系农机维修工和农机加油站以外,农机服务中介主要发挥以下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利用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信息优势,为外来农机手联系作业业务,使外来农机手和本地农户对接;二是借助人情、面子、关系、威望等社会资源,调解外来农机手和本地农户之间的矛盾纠纷。

以担任多年农机服务中介的王德民为例。王德民今年50多岁,Y村张楼庄人,Y村的村副主任,办事能力强、人脉关系广,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王德民曾将一个外地农机手领到Y村唐庄,为农户提供秸秆粉碎服务。但该农机手在田间开展作业过程中,误将一农户家老坟周围种的四棵柏树给旋掉了一棵。恰巧王德民和这户人家关系好,其出面进行协调。最终,这户人家看在王德民的面子上,让农机手赔了一些钱,事情才算平息。王德民回忆说:“当时要是没人领他,这事就没法收拾了!老坟四周种的柏树让人给旋掉了,这还得了?赔再多钱都不行。一来,新栽的树苗能不能种活是个问题,二来,影响家运。要不是我领着他,他就惹大麻烦了。我朋友多、关系多,外地来的机械手也都愿意找我领,有事就让我协调。”(20210716)

不过,“农机+中介”的经营模式也有其局限性。一方面,外来农机手需要承担较高的经营成本。这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支付给农机服务中介的报酬。在Y村,外来农机手需要按照作业面积向中介支付佣金5~8元/亩。二是跨区过程中的高额维修费用。远距离的跨区作业大大提升了农机的损耗速度。同时,由于复杂的作业环境、高强度的作业要求、农机手操作不当等各种因素,大型农机在作业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故障。农机服务中介一般只负责帮外来农机手联系本地的农机维修工,不会介入后续的维修事宜。而本地的农机维修工基于盈利的逻辑,往往会向外来农机手收取较高的维修费用。这直接增加了外来农机手的经营成本。另一方面,外来农机手需要承担较高的经营风险。这种风险主要发生在外来农机手未能顺利找到农机服务中介或中介未能有效发挥其作用的情形之下。这时,外来农机手就要投入更多时间成本来寻找中介或寻找作业业务,也会陷入因和农户基于作业费用、面积、顺序、质量等问题发生矛盾纠纷而被拦机的窘境。而在时间极为紧迫的农忙时节,这意味着外来农机手要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总体上看,外来农机手之所以要承担较高的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与他们的外来者身份以及他们在本地缺乏社会关系资源密切相关。

(三) 乡土社会的运作规则与本地市场兴起

随着国家对大型农机购置补贴力度的不断加大,本地陆续有一些农户投资了大型农业机械,开始从事农机服务经营。就调研的情况来看,本地农机手的群体来源和年龄构成均具有多元化特点。一方面,种田大户和返乡农民工是本地农机手的主要来源。这部分农机手的年龄集中在45~55岁,他们因为耕种土地、照顾孙辈、进城失败等各种原因而成了“出不去的人”。他们用多年务农和务工积累下来的资金购置了大型农机设备,希望通过向周边农户提供有偿的农机服务来增加家庭经济收入。另一方面,在老农机手的带动和影响下,一些平时在外务工、30岁左右的年轻人选择在农忙季节返乡,加入农机服务供给者的行列。至此,当地农机服务市场

开始呈现出外来农机与本地农机并存的局面。

从理论上讲,在农忙时节,农户的农机服务需求具有紧迫性,农机服务供给主体的市场地位要高于需求主体,农机服务市场是供给主导型市场,因此外来农机手可以随时进入当地农机服务市场,以增加农机服务供给。农户的农机服务来源既可以是本地农机,也可以是跨区作业的外地农机^[23]。但从现实情况来看,外来农机手在当地农机服务市场中的地位及份额大幅下降,而由本地农机手提供机械化服务的内生型服务市场逐渐兴起。事实上,农机服务市场出现的这一重大转变,需要放置在全国农机过剩的背景下和乡土社会的语境中来理解。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持续高速发展,目前已出现了农机过剩的现象。在此背景下,农机服务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8]。而农机服务经营活动是嵌入乡土社会的。在农机服务市场竞争中,本地农机手借助乡土熟人社会的运作规则打败了外来农机手,从而推动了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的兴起。

费孝通指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是“熟悉”的社会^[24]。人们因熟悉而彼此信任和认可,并形成了一种对行为规矩的下意识式遵守。乡土熟人社会也因为网络式的人情亏欠而被整合为一个亲密社群。在此基础上,陈柏峰将乡土熟人社会中人情取向的行动规律称为“乡土逻辑”,其包括情面原则、不走极端原则、歧视原则和乡情原则四个方面。其中,情面原则是熟人社会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是从熟悉和亲密中生发出来的一种处事原则,它要求熟人之间必须讲人情、顾面子。歧视原则由情面原则衍生而来,是村民在对待陌生人时所遵循的行事原则,它是指在乡土社会中人们可以漠视陌生人的利益^[25]。概言之,在传统乡土社会,人们会区分对待熟人和陌生人,即遵循“内外有别”的交往逻辑。虽然从全国整体层面来看,乡村社会正在经历着结构性变迁,但在华北平原农村,“内外有别”的乡土规则仍在发挥作用,其指引和约束着常年在村庄里生活的种田农户和农机服务中介的行为选择,从而导致本地农机手与外来农机手在当地农机服务市场中的地位及份额存在显著差异。

与外来农机手相比,本地农机手因来自乡土社会内部而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一方面是信息优势。本地农机手对农户的农田位置、田亩面积、田块数量、家庭劳动力等相关情况都极为熟悉,并能即时知晓本地农作物的成熟情况与作业进度。本地农机手在村域内开展农机服务,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直接并及时地与农户进行精准对接。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社会身份优势。对于农户和农机服务中介来说,与外来农机手相比,本地农机手是自己人。一旦本地有了农机手,农户更倾向于购买本地农机手提供的农机服务。对于农户而言,外来农机手是陌生人,本地农机手是知根知底的自己人,自己人更值得信任,自己人提供的农机服务在质量上也更有保障。而且农户购买本地农机手的服务,也有助于维系和强化交易双方之间的社会关系^[26]。同时,本地农机手对待农户,同样遵循着自己人的行为逻辑。例如,在服务费用上,本地农机手不会与农户过于计较,他们通常将作业面积的零头抹掉再来计算费用。在费用结算方式上,农户如果购买本地农机手的服务,是可以赊账的,一般等到农历年底再进行结算,但如果购买外来农机手的服务,费用必须当场结清。此外,一些具备一定农机维修技术的本地农机手,还会积极帮助农户维修其自购自用的小型农机具。本地农机手的这些行为给农户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和福利,也增加了农户对本地农机手的青睐。在这种情况下,外来农机手为了争取市场份额,不得不在服务价格上做出妥协。以小麦机收服务为例,本地农机手的服务价格为50元/亩,外来农机手则把服务价格降到了45元/亩。但即便如此,外来农机手也未能改变自身在当地农机服务供给体系中的劣势地位。

同样关键的是,农机服务中介的态度和行为选择。随着本地农机手不断增多,农机服务中介对待外来农机手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们不再将外来农机手领入村庄,甚至一些中介自己也转行做起了农机手。相较于外来农机手,农机服务中介会优先考虑本地农机手的利益。对于中介来说,他们和本地农机手都是本村村民,如果继续将外来农机手带入村庄,必然会引发本地农

机手的不满,这既不利于维系与本地农机手之间的长远关系,也不利于维持自身在村庄社会中的名声和威望。而在外来农机手高度依赖农机服务中介的情况下,一旦没有中介“牵线搭桥”,外来农机手便无法建立起与本地村庄之间的社会关联,从而难以顺利进入村庄开展农机服务。这也导致外来农机手的作业面积大幅减少,而本地农机手的作业面积迅速增加。

综上所述,考察农机服务市场的转变趋势,既要注意到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快速发展这一宏观背景,亦不能脱离农机服务经营活动所发生的乡村社会场域,不能忽视农机服务市场中各行动主体的社会身份和行为逻辑。跨区服务面积的大幅减少与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的兴起,本质上是全国农机过剩的背景下农机服务市场竞争的结果。在农机服务市场竞争中,本地农机手借助乡土熟人社会的运作规则打败了外来农机手,从而推动了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的兴起。

三、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的运作逻辑

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的运作高度嵌入乡土社会。在农机服务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农机手以自然村为单位开展农机服务。由于农机服务供给者、农机服务需求者、农机维修工等市场主体同属于乡土熟人社会中的成员,其行为选择受到乡土社会关系网络和村庄社会规范的深刻塑造。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的具体运作过程也因此具有浓厚的社会学意蕴,主要体现在农机服务经营成本和农机服务供给质量两个方面。

(一) 以自然村为单位开展农机服务

在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中,农机手以自然村为单位开展农机服务。这一现象与当前农机服务市场的高度竞争密切关联。一方面,随着大型农机数量不断增长,农机服务从业人员逐渐增多,农机服务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前些年,当地农机手不仅在本地村庄开展农机服务,也到安徽、河北、山东等地进行跨区作业。但正如前文所述,由于农机服务经营活动嵌入乡土社会,在全国农机过剩的背景下,农机手因在外地缺乏社会关系资源而在农机服务市场竞争中缺乏比较优势,跨区作业面积不断缩减,大部分农机手的作业范围也主要局限在本地。在本地农机服务市场刚刚起步阶段,农机手不仅在村庄内部开展农机服务,还到周边村庄进行农机作业。随着本地大型农机数量不断增长,本地农机手要不断增多,大部分村庄都有自己的农机手,本地农机服务市场的竞争也日益激烈。另一方面,农机不断加快的更新换代速度迫使农机手要在最短时间内收回成本,以便在农机被淘汰之前获取利润,这也使得农机服务市场的竞争日益加剧^[8]。在农机服务市场的高度竞争下,为了维持相对稳定的作业面积,本地农机手会充分利用自身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和信息优势,尽可能地与本村庄的农户建立和维持长期稳定的业务关系。因此,在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中,农机手往往以本自然村为基本和首要的服务提供范围。

同时,农机服务市场的高度竞争,也驱使本地农机手借助自身的先赋性社会关系到周边村庄拓展市场,以扩大作业面积。由于购置大型农机是农户的自发行为,当地各个村庄之间的大型农机数量分布并不均衡,不同村庄的农机服务供给能力难免存在差异。到了农忙时节,农机手在完成本村庄的机械作业业务以后,先是通过亲戚、乡邻的介绍,到周边缺乏大型农机的村庄向农户提供农机服务,再通过和服务对象的多次互动与合作,在该村庄建立起较为固定的客户群,从而拓展自己在本地的作业范围。

张师傅今年 50 多岁,是 Y 村张楼庄的一位农机手。张师傅于 2012 年购置了一台大型农用拖拉机和与之配套使用的旋耕机、秸秆粉碎机,后来又陆续添置了一台小麦联合收割机和一台大型玉米收割机。在玉米收获时节,张师傅在张楼庄收割完玉米以后,让儿子驾驶拖拉机在张楼庄为农户粉碎秸秆,自己则驾驶玉米收割机到亲戚家所在的芦山村,为该村庄农户提供玉米机收服务。芦山村距离张楼庄大约 15 公里。在

芦山村干活期间,张师傅中午在亲戚家吃饭,晚上把收割机停放在亲戚家,其本人回家。这些年来,张师傅每年都到芦山村收割玉米。一到玉米成熟时节,芦山村的农户就会主动联系张师傅。(20210717)

总的来说,在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中,农机手以自然村为单位开展农机服务。在农机服务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本地农机手会充分利用自身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和信息优势,与本村庄的农户建立和维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以维持相对稳定的作业面积。同时,农机服务市场的高度竞争,也驱使本地农机手借助地缘、血缘等先赋性社会关系到周边缺乏大型农机的村庄寻找业务,从而拓展自己的作业范围。

(二) 熟人关系降低农机服务经营成本

本地农机手嵌入由地缘、血缘等社会关系编织而成的乡土熟人关系网络。他们在村域内从事农机服务经营,熟人关系可以较大程度地降低其经营成本,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熟人关系可以降低经营中的信息获取成本。在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中,农机手一般只在村庄范围内开展农机服务。作为村民长期共同生产和生活的空间单元,村庄是一个熟人社会。农机手和其主要服务对象共同生活于一个村庄之中,彼此知根知底,并互相信任。例如,通常来讲,测量农田面积是农机服务交易过程中的必要环节,也是需要花费时间并且容易产生争议的一个环节。但农机手为本村庄农户提供农机服务,是不需要量地的,而是由农户自报田块面积。这就使得农机手可以节省出更多时间来进行农机作业。即使一些农户抱着投机或侥幸心理少报田块面积,农机手也不会与之斤斤计较。实际上,很少有农户会瞒报或少报田块面积。因为到了农忙时节,邻里乡亲都在田间地头,这些群体能够有效监督作用。正是因为村庄熟人社会自带信任机制和监督机制,农机手不需要再专门找人负责量地等事项,其一个人就能独立完成农机作业。

其次,熟人关系可以降低经营中的协调成本。一方面,农机手与本村庄农户之间形成了一种高效默契的对接方式。同时,同一村庄的农机手之间也本着互相礼让的原则来协调彼此的关系。到了农忙时节,农机手无须主动联系农户,许多农户会直接到农机手家里和其约好作业时间。每天天不亮,农机手便迅速下田开展农机服务。村庄中的其他农机手如果看到某片区域内已有农机在田间作业或已有农机停在地头,便会自觉地另找一片作业区域。在村庄范围内,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基本上是同步的,农机手的服务价格也是统一、透明的,不存在讨价还价。农机手在各自所在区域内有序、高效地开展作业,农户们则直接站在地头,等待附近的农机手到达自家农田提供机械化服务。在熟人关系的约束下,农机手和本村庄农户之间也很少发生矛盾纠纷。如果农机手在提供服务过程中不小心损坏了本村庄农户的庄稼,农户往往会给农机手留个面子,不会与之计较。这与农机手开展跨区服务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位被访农机手抱怨道:“去外地割麦,压倒人家的麦子,要是遇上无赖,得按麦粒数赔偿,一颗麦粒一块钱!所以,要是去外地割麦,最少得带两三个人专门负责指挥。”(20210720)

最后,熟人关系可以降低经营中的维修成本。如前所述,大型农机的故障率较高,农机手需要经常对农机进行检查、维修和养护。农机维修成本是农机服务经营成本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开展跨区服务的农机手而言,大型农机的维修费用相当高昂,甚至直接决定了农机手的盈亏情况。曾经到外地开展农机服务的农机手杨师傅用“车挣车花、人工白搭”来形容大型农机故障频发及高额维修费用所带来的运营风险。而在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中,农机手和农机维修工都是本地村民,他们彼此熟识,交往互动频繁。当本地大型农机出现故障时,农机手通常只需要承担较低的维修成本。一般情况下,农机维修工只向本地农机手收取“配件钱”和象征性的人工费。如果机械故障较小,农机维修工则干脆直接通过微信或电话指导农机手如何处理机械故障。事实上,本地农机手借助与农机维修工之间的熟人关系,不仅降低了维修的经济成本,还

降低了维修的时间成本。Y村八里庄的老谢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农机修理工,他在村公路边开了一家农机修理部。为了不耽误本地农机手白天的作业进度,老谢经常连夜赶工修理农机。(20210723)这既降低了农机手的经济损失,也极大地维护了农户的经济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农机服务经营成本的高低会直接影响服务经营主体的经营积极性与经营决策。如果经营成本较高,农机手的经营积极性受到打击,他们便会逐渐缩小服务范围 and 规模,甚至选择退出农机服务行业,另寻其他增收渠道。相反,如果经营成本较低,农机手便能获得较高的净收益,从而有实力和动力不断添置和更新大型农机设备。在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中,农机手由于投入较低的经营成本便可顺利开展农机服务并获得可观的经济收入,因而普遍具有很强的经营积极性,且不少农机手都已经实现了提高经济收入与添置更新农机之间的良性循环。这使得本地农机服务供给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证。

(三) 声誉机制保障农机服务供给质量

农机服务供给质量是农户极为关心和敏感的问题。从理论上讲,农业生产本身的自然属性使得农机服务供给行为中存在较高的机会主义风险^[13]。随着农机社会化服务的迅速发展,农机服务质量对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和产量具有重要影响。但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和周期性特征,只有到了农作物的收获季节,才能看出生产效果。而农作物的生长状况和收成,除了受农机服务质量的影响,还会受到气候条件、土壤墒情、水利设施、农资质量、田间管理技术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这就导致农户对农机服务质量的监督困难,并容易诱发农机服务供给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造成农户的利益受到损害。但调研发现,在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中,农机手们普遍能够为农户提供较高质量的农机服务,且这一现象与村庄社会中的声誉机制有着密切关联。

村庄社会为声誉机制的有效运行提供了基础性条件。总的来说,声誉机制的有效运行是通过村庄社会内部的公共舆论机制和非正式制裁机制来实现的。一方面,村庄公共舆论是声誉机制得以有效运行的前提。村庄公共舆论具有重要的道德评价功能。如果某个村民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或其他道德风险行为,该村民便会受到村庄舆论的负面评价。村庄公共舆论也具有强大的信息传播功能。在华北平原农村,村庄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在村庄熟人社会中,信息是高效流动和充分共享的。如果某个村民受到村庄舆论的道德谴责,该村民的负面信息便会在村庄中快速传播。另一方面,村庄社会内部的非正式制裁机制使声誉机制产生了威慑效应和激励效应。一旦某个村民的负面信息在村庄中传开,该村民必然会受到相应的社会性制裁。其他村民无须诉诸外部干预,只需要在村庄社群活动中对该村民采取冷落、排斥等边缘化策略,便足以使其在村庄社会中举步维艰^[27]。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在村庄场域中展开运作。如果某个本地农机手因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投机耍滑而受到村庄社会的负面评价,其在本地区域上的业务量不仅会大幅减少,甚至会被“驱逐”出本地市场,还会在往后的村庄社会交往中受到冷落或排斥。而且某个本地农机手一旦声誉受损,即便其后来改进了农机服务质量,也要经历漫长的过程,才能重新获得村庄社会的认可和接纳。

举例来讲,李师傅是Y村张楼庄的一位农机手。为了降低油耗和节省时间,李师傅在向农户提供小麦机收服务时,将麦茬留得过高。而在华北平原地区,农民在收割完小麦后需要立即种植玉米,但留茬过高就会耽搁玉米播种,进而影响玉米产量。为此,农户们纷纷在背地里指责李师傅“不地道”,以至于李师傅后来给儿子建房,村庄里也极少有人愿意去帮忙。同一村庄的张师傅在为农户收割小麦时,会尽量将收割机的割台调低,将麦茬留低一些,从而不影响下茬作物播种。这样,虽然亩均机械作业利润降低,但张师傅赢得了声誉,“接的活多,机器不闲着”,最终仍获得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收益。而李师傅因名声不好,在本地区域上接不到多少活,只好到南方农村开展农机服务,但由于在外人生地不熟,修理农机时被宰,最终也没赚到钱。为了重新积累在本

地市场上的客户资源,李师傅在很大程度上改进了农机服务质量。但即便这两位农机手的服务质量目前已基本持平,李师傅在本地市场上的客户资源仍远少于张师傅。(20210717)

为了建立和维持良好的声誉,从而维持与农户之间长期的交易关系和社会关系,绝大多数本地农机手都会尽可能地提高农机服务质量。例如,在小麦机耕环节,本地农机手往往采取深耕深耕的方式,这有助于提高土壤的蓄水和保墒能力,从而增加小麦产量。在小麦机收环节,本地农机手通常会在每次出车之前对联合收割机的传送皮带、链条等部件进行仔细检查和及时调整,并在开展作业过程中根据小麦的成熟度、干湿度等情况灵活调整作业速度,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小麦丢损。此外,不少农机手会在农忙之余,钻研和学习大型农机的驾驶操控、设备调整、故障排除等专业技术知识,不断提升驾驶和操作大型农机的技能和水平。从表面上看,农机手的这些行为是不理性的,因为他们浪费了时间和精力,压缩了利润空间,但从长远来看,他们由此获得了农户们的信任、好评乃至尊重,并在本地市场上积累了更多的客户资源,获得了更多的交易机会。在这个意义上,确保农机服务质量恰恰是本地农机手基于长远考虑的理性选择。

总而言之,在村庄社会中,人们十分看重声誉。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在村庄场域中展开运作,农机手的声誉是农户在选择服务供给者时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本地农机手如果因投机耍滑而声誉受损,其所要承担的不利后果不仅体现在农机服务交易本身,还延伸至村庄社会交往领域,且这种不利后果并非暂时的,而是长期的。声誉机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本地农机手的机会主义行为,并能够激励农机手不断提升和改进农机作业质量。就此而言,在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中,声誉机制有助于农户获取优质的农机服务。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豫东Y村的田野调查,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了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的兴起与运作逻辑。研究发现,在农机社会化服务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跨区服务面积大幅减少,而以本地农机手为服务供给者的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逐渐兴起,且社会因素在其兴起与具体运作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农机跨区服务曾是小农户实现机械化生产的重要途径,农机服务中介是实现外来农机手与本地农户顺利对接的桥梁。随着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快速发展,大型农机拥有量不断增长,农机服务市场开始呈现出外来农机和本地农机并存的局面。而跨区服务面积的大幅减少与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的兴起,本质上是全国农机过剩的背景下农机服务市场竞争的结果。在农机服务市场竞争中,本地农机手借助乡土熟人社会的运作规则打败了外来农机手,从而推动了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的兴起。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的运作是高度嵌入乡土社会的。从服务供给范围来看,在农机服务市场的高度竞争下,农机手以自然村为单位开展农机服务。从服务经营成本来看,农机手置身于乡土熟人关系之中,熟人关系可以有效降低服务经营成本,而较低的服务经营成本能够充分调动服务经营主体的经营积极性,从而确保农机服务供给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从服务供给质量来看,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在村庄场域中展开运作,村庄社会中的声誉机制有助于农户获取优质的农机服务。

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的兴起与运作逻辑,对探索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具有重要启示。第一,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应充分发挥乡村社会的内生优势。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的出现展现了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一种新的路径,体现了乡村社会助推现代农业发展的内在潜力。学者需要将现代农业发展实践放置在具体的乡村社会情境中,而非将其悬置在一个抽象的真空中进行考察,去探究促进和制约其发展的社会因素。政府应重视现代农业发展的社会基础^[28],立

足于现实农情和农村社会基础,有针对性地制定农业政策。第二,政府应因地制宜,积极培育和扶持本土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主体,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挖掘其发展潜力。一是鼓励和引导外出务工的农村青年返乡在生产性服务领域创业,提升本地生产性服务供给的稳定性和均衡性,增加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活力;二是加强对本土个体形式的服务主体的扶持和补贴力度,在农村社区层面对个体型服务主体进行整合^[29],提升农村社会内部的生产性服务供给能力,促进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总之,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既要发挥乡村社会本身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支撑作用,又要将农业发展与农村和农民的发展内在地融合起来。

参考文献:

- [1] 农业农村部.2021 年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统计公报[EB/OL].(2022-08-17)[2022-10-12].http://www.njhs.moa.gov.cn/nyjxhqk/202208/t20220817_6407161.htm.
- [2] 王海娟,胡守庚.合作瓦解:农业机械化发展的一种解释路径——兼论中国农业发展的道路选择[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2):38-45.
- [3] 焦长权,董磊明.从“过密化”到“机械化”:中国农业机械化革命的历程、动力和影响(1980—2015年)[J].管理世界,2018,34(10):173-190.
- [4] 印子.农地的社会功能及其制度配置——基于华北农村“小农户家庭经营”案例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22,43(8):19-31.
- [5] 蔡键,刘文勇.社会分工、成本分摊与农机作业服务产业的出现——以冀豫鲁三省农业机械化发展为例[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7(4):83-92.
- [6] 潘经韬,陈池波.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发展的影响——基于2004—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27-34.
- [7] 李宁,汪险生,陆华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机作业服务的双重角色及其动态转变: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J].农业经济问题,2021,42(2):38-53.
- [8] 陈义媛.中国农业机械化服务市场的兴起:内在机制及影响[J].开放时代,2019(3):169-185.
- [9] 蔡键,唐忠.华北平原农业机械化发展及其服务市场形成[J].改革,2016(10):65-72.
- [10] 仇叶.小规模土地农业机械化的道路选择与实现机制——对基层内生机械服务市场的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7,38(2):55-64.
- [11] 李洪波,袁鹏,罗建强.乡村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形成机理及其运行机制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22,43(1):89-99.
- [12]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钢,刘阳,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46.
- [13] 罗建强,姜亚文,李洪波.农机社会化服务生态系统:制度分析及实现机制——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视角[J].农业经济问题,2021,42(6):34-46.
- [14] 徐秀英.完善和发展农机跨区作业模式的思考[J].农机化研究,2011,33(6):240-244.
- [15] 方师乐,卫龙宝,伍骏骞.农业机械化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分布规律——农机跨区服务的视角[J].管理世界,2017(11):65-78.
- [16] 方师乐,黄祖辉.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农业机械化的阶段性演变与发展趋势[J].农业经济问题,2019,40(10):36-49.
- [17] 农业农村部.2022 年国家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措施选编[EB/OL].(2022-06-15)[2022-07-01].http://www.zcggs.moa.gov.cn/zcgc/202206/t20220615_6402470.htm.
- [18] 李农,万伟.我国农机购置补贴的宏观政策效应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0,31(12):79-84.
- [19] 周应恒,张蓬,严斌剑.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促进了农机行业的技术创新吗?[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6,15(5):489-499.
- [20] 方师乐,卫龙宝,史新杰.中国特色的农业机械化路径研究——俱乐部理论的视角[J].农业经济问题,2018,39(9):55-65.
- [21] 李佩,罗必良.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本地化”及其“价格悖论”[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3):47-57.

- [22]徐宗阳.机手与麦客——一个公司型农场机械化的社会学研究[J].社会学研究,2021,36(2):92-114.
- [23]黄炎忠,罗小锋.跨区作业如何影响农机服务获取?[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89-97.
- [24]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3.
- [25]陈柏峰.熟人社会:村庄秩序机制的理想型探究[J].社会,2011,31(1):223-241.
- [26]李虹韦,钟涨宝.熟人服务:小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的优先选择[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1):121-127.
- [27]吴元元.认真对待社会规范——法律社会学的功能分析视角[J].法学,2020(8):58-73.
- [28]陆益龙.现代农业发展的困境与变革方向——河北定州的经验[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122-129.
- [29]李俏,王建华,吴林海.农业社会化进程中的个体服务形态及发展思路[J].贵州社会科学,2014(2):49-53.

(责任编辑:李凌)

The Logic of the Rise and Operation of Endogenous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ervice Market: Field Investigation Based on Y Village in East Henan

LI Aishuang

Abstract: The cross-regional service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small farmers to realize mechanized production and integrate into the development track of modern agriculture.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the cross-regional service area has been greatly reduced, and the endogenous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ervice market with local agricultural machinery operators as service providers has sprung up rapidly, and social factors have played a key role in its rise.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n China, the number of large agricultural machinery continues to increase, and the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ervice market presents the coexistence of nonlocal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nd local agricultural machinery. In the competition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ervice market, local agricultural machinery operators defeated nonlocal agricultural machinery operators by virtue of the operation rules of local acquaintance society, thus promoting the rise of endogenous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ervice market. The operation of endogenous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ervice market is highly embedded in the rural society. In the highly competitive situation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ervice market, agricultural machinery operators carry out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ervices in natural villages. Agricultural machinery operators are embedded in the local acquaintance relationship, which can reduce their operating costs. Lower service operating costs can enhance the operating enthusiasm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operators, so as to ensure the st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ervice supply. The reputation mechanism in the village society can effectively inhibit the opportunistic behavior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operators and encourage them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service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The emergence of endogenous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ervice market reflects the internal potential of rural society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and ha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or exploring the road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ervice Market; Rural Society; Acquaintance Relation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